

解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的本質(上)

自從2016年「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提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政治口號後，不少參與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的反對派和積極投身於各種「抗爭行動」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紛紛以此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鬥爭主題、戰鬥吶喊或人生奮鬥目標。在過去一年多香港爆發的超大規模暴亂中，很多參與者在眾多大大小小的示威和衝突事件中都突出展示和高聲呼喊這個政治口號，彷彿這個政治口號代表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共同行動目標之一。

不過，經過多年來的演變，這個政治口號在不同的人和群體中出現了不同的理解和演繹，就連梁天琦本人對這個政治口號的內涵也曾作出多次修改。總的趨勢是，隨着香港的政治鬥爭愈趨激烈化、白熱化和暴力化，這個口號往往也被部分「抗爭者」賦予更激進的內容。

字面上的理解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政治口號可以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進行探討。這個政治口號的字面意義其實頗為清晰，不難理解。實際上，從那些認同和呼喊這個政治口號的「抗爭者」的衆多言論和行為來看，他們對這個政治口號的理解其實與它的字面意義頗為接近。與此同時，這個政治口號的字面意義又與過去十多年在香港冒起的、尤其讓不少年輕人如蟻附膻的「本土分離主義」所宣示的政治主張在意義上又相當耦合。所謂「本土分離主義」指那些相信香港人正在受到來自中國內地的各種「入侵和威脅」，因此香港必須要擺脫中國才能保衛香港人的各種利益的不同政治思想和主張。以此之故，我們可以就「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政治口號從字面上和政治歷史背景上作出梳理和理解。

首先我們可以從字面上去理解「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政治口號，而我相信大多數參與各種「抗爭行動」的人也是從字面上去理解它，否則的話這個政治口號便失去了觸動情緒、製造怨氣、引發危機意識、燃點正義感和煥發鬥爭意志的效用。

據我個人觀察，我對這個政治口號在字面上的理解應該也是受過一定教育的香港人的理解。顯然，這兩句口號很有感染力和煽動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和呼應部分香港人內心深處對香港的現況和未來的擔憂和對內地的不滿與恐懼，從而促使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覺得他們不能依靠那個中央任命的特區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政府來捍衛香港現有的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和自治，並避免它們受到來自中國內地的破壞、扭曲、改變和稀釋，因此必須自發行動起來「拯救」香港。

在「拯救」香港的過程中，除了排斥來自中國內地的影響和干擾外，還必須推翻香港現有的政府和政治體制，讓「真正」的香港人能夠掌握香港的政權，讓那個新政權完全向香港人效忠和負責，否則便難以圓滿達到「拯救」香港的目的。

包含顯而易見的分裂主張

所謂「光復」，一般人的理解是恢復已經滅亡的國家或者收回失去的領土。《應用漢語詞典》對「光復」的定義是「收復失去的國土，恢復已滅亡的國家」。《晉書·桓溫傳》提到「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中國近代革命家章炳麟在其《〈革命軍〉序》中說：「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這裏章炳麟把「光復」



學者論衡
劉兆佳

和「革命」兩個詞語連在一起運用。）在香港，的確有部分認同和呼喊「光復香港」的人否定香港是中國固有的領土，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沒有主權，但中國卻在1997年在沒有取得香港的「原住民」或「香港民族」的同意下「強行佔領」香港，把香港變成中國的「殖民地」，讓香港經歷「第二次」的「殖民主義」。在這種字面意義下，「光復香港」是要把中國驅逐，並讓香港人「獨立建國」。沒有那麼激烈的主張則是要迫使中國政府容許香港舉行「公投自決」，讓香港人自行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命運。較為「溫和」的主張是容許中國繼續擁有對香港的主權，在香港繼續實踐「一國兩制」，但中國政府則授權香港特區進行「完全自治」，在這種安排下，香港特區儼然成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中國政府在香港特區的事務上實際上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責任。與此同時，香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也沒有任何責任和義務。

部分呼喊「光復香港」的人則除了要在政治上「光復」香港外，還要在社會、經濟和文化意義上「光復」香港。他們提倡停止或大幅減少香港與內地的社會聯繫、人員交往、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從而達到徹底的「去中國化」，從而讓香港得以保留其原來的獨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無論是那種意義的「光復香港」，其共同點都是敵視和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領導中國政府的中國共產黨，都是

歧視、輕蔑和排斥內地同胞，都是要用某種方式把香港從中國內地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割裂和分離，讓香港在名義上或實質上或在兩個方面都不再隸屬於中國。

所謂「革命」一般是指在極短時間內通過武力或其他激烈手段推翻或者徹底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家／地區體制、政治制度、政權或政府。《應用漢語詞典》對「革命」的定義是「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古代漢語詞典》則說：「古代認為帝王受命於天，改朝換代是天命變更的結果，因而稱之為『革命』」。有些「抗爭者」則從更廣闊的角度理解「革命」：「革命」不但要推翻或者徹底改變政治性的東西，更要推翻或徹底改變一個社會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思想體系。

以建「政治實體」為根本目的

因此，我對「時代革命」的理解為：一個不同階層和不同背景香港人都可以參與的、切合和呼應新時代要求的、目標在於推翻或徹底改變香港的政府和政治體制，並在香港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制的大規模和激烈的政治行動或「革命」。

認同和呼喊「時代革命」的人聲稱香港現有的政府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非通過普及選舉產生的非民主或威權政府，所以無論是香港政府或者是香港的政治體制都不民主和缺乏認受性，因此必須推翻或徹底改變，就算不能馬上達到目的，也必須以各種鬥爭行動削弱香港政府的政治威信和管治能力，不讓其能夠在香港實現有效管治，其中衝擊警察隊伍、圍堵政府機構、破壞公共設施

、癱瘓交通、罷工罷市罷課、暴力和恐怖襲擊都是被不少參與「抗爭行動」的人較多運用的手段，而最終目的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符合西方民主價值觀的、當權者由香港人通過普及和平等選舉產生的政治體制。

「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共同構成一個整體論述，所以應該連在一起來理解。我們從認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人的大量言論和行動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綜合觀察。

這些人認為，因為要「光復香港」，所以也必須要完成「時代革命」，原因是對於那些爭取「光復香港」的「抗爭者」來說，只有在「時代革命」成功之後香港才能完全「光復」。因為就算香港能夠以某種方式擺脫中國，如果香港的政權的性質、取態和產生方式沒有根本改變，則香港的管治權力仍然會掌握在那些「親北京」或者依附於中共政權的勢力的手中，而所謂「光復香港」也只會是形式上的「光復」而非實質上的「光復」，因為香港的政權仍然沒有通過「西方式」的民主選舉程序產生，依然沒有落到那些熱愛自由、民主和公義的「真正」香港人的手中。所謂「真正」的香港人，是指那些認同和實踐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反共、反中、親西方）的香港人，而其他的香港人則被排除在外。「抗爭者」以是否認同和實踐共同的價值觀來定義某人是否「真正」香港人，令「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政治口號背後的政治主張帶有某種「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和排他性的色彩。

註：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譽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普檢「成本效益論」涼薄短視

有話要說
溫滔森

為找出新冠肺炎隱形患者，政府早前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計劃昨日結束，逾176萬名市民完成採樣。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學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至今找出26名隱形患者並不是細數目，若果政府沒有展開普檢計劃，這些患者可以製造第二、第三代傳播。

然而，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高本恩（Ben Cowling）日前卻質疑計劃不符成本效益，又不點名批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前「唔好再討論開支值唔值得」的說法，宣稱「政府的基本責任就是慎用公帑」云云。不諱言的說，高本恩的所謂「成本效益論」，背後反映他不懂公共財政理念，把抗疫防疫當作一盤生意來看。

誠然，政府確實有責任慎用公帑，但是何謂慎用？抗疫不是一盤生意，藉檢測找出隱形傳播鏈，為的是拯救人命，不能用檢測成本高低來衡量

。就如偏遠地區的道路，使用率肯定低於市區道路，成本效益一定不高，難道不該興建乎？

同樣道理，利用公帑展開普檢計劃，為的是找出隱形患者和截斷隱形傳播鏈，從而減低新冠肺炎社區爆發風險。高本恩所提到的「陽性率低」，只反映社區內的隱形患者人數不多，以及病毒尚未社區大規模爆發，這根本是一件幸事，跟有否善用公帑，沒有直接關連。難道我們要因為檢測費用高，所以放任隱形患者不管，要等到疫情在社區大爆發、「陽性率」飆高，才展開普檢乎？

拯救人命豈是「一盤生意」

至於高本恩提到，普檢發現的患者，部分已出現病徵，只是在求醫時未安排檢測，這一現象不是正正反映部分醫療機構或人員存在人為疏忽，好在政府展開普檢才能發現「漏網之魚」，反證普檢的功用嗎？如果沒有普檢，這些人可能仍然以為自己患的是普

通發燒和咳嗽，豈不是增加病毒在社區爆發的風險？

退一步而言，我們即使真是要審視普檢計劃的成本效益，高本恩的成本效益計算方法，也是有問題的。我們應該看計劃能否找出隱形傳播鏈，能否盡快將本地個案「清零」，並且在此之後，採取有效的檢疫和隔離措施，避免入境者造成本地感染，從而盡快讓社會在防疫常態化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換句話說，只要防疫措施越能縮短經濟恢復正常的時間，其成本效益便越高。

由此可見，高本恩宣稱不參與普檢的人是「最明智」，只不過是自吹自擂。先不論部分市民不願參與普檢的原因，但他們有機會感染病毒而不自知，但他們卻因為各種理由不參加普檢，變相增加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從而拖累香港經濟復甦的時間。這樣的所作所為，不但算不上是「明智」，亦不符合所謂的「成本效益」，只是缺乏公民意識的愚蠢表現。

時事評論員

築起三道「安全門」為大學消「獨」



焦點評論
吳志斌

香港各大專院校本月初以網上授學形式開啟了新一學年。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受控之際，「政治病毒」又在校園悄然抬頭，意圖再次將校園變成政治角力場。近日，港大一則迎新影片，暴露出「修例風波」之後，香港大專院校尚未清除政治迷障。

該影片透過校園電台公開傳播，內容肆意抹黑內地學生和國家形象，為「港獨」「招魂」。這種亂象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香港的大學如何可以真正地做到「讓教育回歸教育」，以杜絕反中亂港分子利用學生作為自身政治牟利的「替罪羊」，將校園變成反中亂港橋頭堡。

對無德教師零容忍

大學本應是傳道授業解惑的育人之地，絕非播「獨」洗腦之所，更不應成為反中亂港橋頭堡。教職員是大學運作的核心，對其思想肅正是替校園消「獨」的第一步。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身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卻鼓吹「違法達義」的歪理邪說、策劃操控選舉的「雷動」和「風雲」計劃；當香港受到黑暴和疫情雙重打擊，經濟陷入衰退時，他仍不忘策動非法「初選」圖謀奪權。然而，港大管理層一直對戴耀廷的惡行視而不見，直至今年7月，港大校務委員會才將這類「毒瘤」徹底清理出校園。

古語云「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像戴耀廷般披着學術外衣，無視「一國兩制」、憲法、基本法和本地法律，明目張膽販賣「港獨」毒藥的無德教師，大學必須採取零容忍態度，絕不姑息，為杜絕顛覆勢力入侵校園把好第一道「安全門」。

把好大學第二道「安全門」，必須對學生會做好監督工作。香港的大學學生會是一個獨立於大學行政結構的註冊組織，擁有財政自主和明確的政治訴求。在鼓勵和支持學生會以獨立自主的姿態思考社會政治議題的同時，也必須要使學生團體意識到，學

生會的運作不能獨立於「一國兩制」的框架，更不能自由地與「港獨」勢力同流合污，一同走向「毒」途末路。

5月21日，港大學生會選舉的時候，候選會長葉芷琳妄稱：「『港獨』是最理想的出路」；6月9日，理工大學學生會發起「和你貼」，在校內「民主牆」張貼「港獨」標語和文宣。遭到學校管理層的多次警告和清理後，學生會又以所謂「打壓言論自由」和「實行洗腦教育」為由，公開控訴校方。

大學時期是個體走向成年、邁入社會的關鍵時期，更是三觀形成的重要階段。亂港分子恰恰是趁大學生思想尚未成熟和血氣方剛，向他們灌輸反中亂港、「港獨」等意識，煽動他們成為暴亂和本土恐怖主義行為的「衝鋒隊」。所以，如何讓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會能自覺地與黑暴勢力、亂港分子割席，回歸到基本法的前提下，為香港社會發展而同心同德，這是擺在各界有識之士面前的一場考驗。

樹立正確的愛國愛港教育觀是把握好大專院校的第三道「安全門」。香港八大院校一直以學術包容和文化多元備受國際讚譽。但也必須意識到，對於許多香港本地學生，對國家的認知始終是從媒體報道中得知的模糊影像。尤其是，具有民族認同的通識教育之缺乏和「去殖民」工程的未完成，導致部分香港學生始終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有着莫名的崇拜，卻把國家錯誤地與「經濟落後」等負面形象畫上等號。故此，大專院校在課程方面做到去除西方中心主義價值理念，推動中華傳統文化普及，創造機會讓本土學生親赴內地交流，感受祖國山河人文，以情感認同和文化認同作基礎，樹立正確的政治判斷，明辨善惡是非，使自成為香港青年在精神上回歸中華故土的一座精神橋樑。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讀者來稿
銀鵲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及美國牽頭的地緣政治挑戰，一年來的中國絕不能稱為風平浪靜。可是，在內外重重挑戰中，我們見到國家從容不迫，顯出了大國的風範，也展示了中國軟實力的一面。

首先，中國醫護人員在抗疫中發揮了高素質的專業水準，捨生忘我挽救生命；在應對策略方面，無論是「封城」、全民檢測，乃至強制在公共場所戴口罩，都顯得調度有致，成功在極短時間內控制了疫情，避免疫情在全國大範圍爆發。

危機亦顯示中國醫療科學水平已處於世界前茅。過往，部分香港市民認為內地醫學水平落後，但經過新冠肺炎一役，國家醫學水平教人眼前一亮，不僅以鍾南山院士為首的醫學專家有着超水準表現，內地在破解病毒基因、測試劑和疫苗研製方面同樣有着非凡表現，中國更樂於與世界各國分享抗疫經驗，充分表現中華民族大愛無疆的精神。

此外，多個國際組織也公開讚揚中國的公共醫療系統的水平。中國在極速時間內興建多家方艙醫院、雷神山和火神山醫院，成阻截病毒蔓延的關鍵，這是長期以來民本精神的表現。世衛同時指出，中國先進的通信網絡，能快捷為全國民眾提供正確的醫療信息，一方面減少民眾的惶恐情緒，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民眾的醫學常識，也為中國抗疫立下汗馬功勞。

援港醫護贏盡港人掌聲

與此同時，抗疫期間官民上下一心，民眾配合政府要求，忍受行動自由被短暫限制，為戰勝疫情換來了黃金時刻。不像一些國家，政黨在抗疫時互相攻訐，政客為私利淡化疫情、國民只顧個人利益反對防疫措施、謾過國人……

而中國的科技發展亦是成功抗疫的重要因素，中國的電子錢包、電商、外賣應用程式已非常普遍，透過電子錢包、網購等，可大大地減少現金

交易，民眾亦能安坐家中購物、叫外賣，令社交限制得以妥善落實，可見中國防疫的成功，是與國家的科技實力分不開的。

最後，當然要一提的是，內地支援隊馳援香港。協助特區政府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近600名支援隊員在港奮戰十四天，替逾176萬名市民的樣本進行病毒核酸檢測，查找到20多名隱形患者，大大減低了本地社區的感染風險，也令香港的新冠肺炎感染疫情漸趨緩和，讓香港百業的復甦重現曙光，社會民生及生活秩序有望回復正常，贏得香港民眾的掌聲。數千封中小學生的慰問卡寄送給支援隊員，這都是國家對香港的關愛打動了香港民心的表現。

在抗疫期間，中國面對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無間斷的挑釁，始終保持克制，避免國際局勢升溫，中國始終以和平合作、共同發展、顧全大局為方針，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本質。

資深教育工作者